




俄罗斯战略问题

ELUOSI
ZHANLUE WENTI
10JIANG

10讲

杨育才 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俄罗斯

战略问题十讲

□ 杨育才 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罗斯战略问题十讲/杨育才著.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626-2331-1

I. ①俄… II. ①杨… III. ①国家安全—研究—俄罗斯
IV. ①D751.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9121 号

俄罗斯战略问题十讲

杨育才 著

出版发行: 国防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口甲29号
邮 编: 100071
电 话: (010) 68400000

责任编辑: 黄建国

特邀编辑: 王立东

责任校对: 刘淑宏

封面设计: 王联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2.8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自序

近代以来俄国（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既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因素，也是对抗西方列强的重要倚重力量，既损害过中国的主权，也引导过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抛开恩怨看历史，对俄国道路的借鉴一度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特别是在革命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曾经长期以俄为师，全方位地学习苏俄。苏联解体后，俄国的国际地位大幅下降，国力对比变化使中俄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可以说，两国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世纪新阶段，如何看待俄国的发展？如何处理与俄国的关系？如何判断未来中俄战略关系的走向？如何定位中俄两国的安全和战略合作？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相互借鉴安全和发展经验？这一切都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研究的长期课题。

新时期常有人议论俄国的衰落，从鼎盛时期的苏联、苏联解体直至今天，俄国综合国力下降是基本事实。但是，展开世界地图，在全球竞争的国际大舞台上，俄国依然是首屈一指的欧亚大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军事强国。对比各国各地区的近代历史，走独立发展道路的俄罗斯依然是值得研究的个例。分析现实社会发展，俄国行进在重拾大国地位的复兴之路上。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前进道路曲折，但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在应对国际危机实践中，常见俄国的身影闪烁，声色俱厉，炫人耳目。新时期的俄国人口不到中国的九分之一，其国内生产总值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但国际政治和战略能力突出，能够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按照现实的国际作为判断，俄国的国际地位远远超出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人口和经济潜力，俄罗斯中亚、南高加索和新东欧地区与美国展开激烈角逐，在东南亚、中东和印度洋地区也都能保持一定的影

影响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连续两年被《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领袖，所形成的反差发人深省。可以说，在当今国际竞争时代，已经衰落的俄国仍然不失为一个适于学习和借鉴的类型。自然，俄罗斯选择的强国道路充满对抗性，经常显现出与当今西方世界的格格不入，并因而给本国未来前途带来不确定影响，如何学习借鉴需要加以具体分析。不容置疑的是，俄罗斯人的“冒险”和国际行为的“非理性”也成为人们感兴趣的方面。

对于中国，发展对俄关系和加强学习借鉴需要保持一种对历史的反思。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对俄国的学习中断。当时所中断的是一种仰视式的学习，这种仰视式学习的中断是中国社会自身的成长使然，中国开始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建构独特的国际政治话语。自中俄（苏）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中融合了相互学习借鉴的成分，学习借鉴不再是单向度，学习借鉴的方法和内容也与以前大不相同。发展道路和安全思想已经不再依赖俄国的安全知识。相反，研究俄国的同时也包括一定程度的反思。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学者从苏联解体和俄国衰落的失败教训方面展开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学习借鉴俄国的意愿，转而采取或者竟已习惯于批评的视角。一些研究更显示出对于向俄国学习的厌弃，似乎俄国可供中国学习的资源在所有方面都已经穷尽。实则不尽然，实际上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国家安全领域，俄国可供中国学习的资源还很充裕，这是笔者长期研究俄罗斯安全战略的重要体会之一。

国家安全战略是针对国家利益威胁挑战和捍卫国家安全利益的整体战略谋划和指导。对于俄罗斯安全战略研究，笔者的体会是坚持主客观因素的结合，既要见物，更要见人。见物，就是研究实践的物质条件；见人，就是研究对实践的战略指导。以军事战略研究为例，影响军事战略的因素既包括国家和社会的客观发展阶段、国际战略形势、军事技术装备的发展、国家动员体制、战争经验和战略传统、战略对手的情况等客观因素，也包括高层及学术精英对战略形势的判断，对未来战争特点的预测，对军队发展方向及编制体制改革的看法。物质的客观条件不能超越，人的主观抉择也必须考虑。国家安全战略既包括国家战略决策层的主观意志和战略决断能力，基于武器和人的双重因素的军队执行能力，也包括影响决策和

执行环节的军事学术理论。

近年来，有幸在国防大学的不同班次分别讲授俄罗斯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课程。把不同专题的讲义串起来，加以整理扩充，便成本书。

本书的主要内容分为十讲，大体上保持教学课程的逻辑。第一讲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课题，带有总纲性质，代表作者对俄罗斯国家安全问题的基本看法。第二讲至第五讲属于国家安全专题，分别探讨苏联国家安全、俄罗斯联邦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现实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俄国安全战略的传统影响因素。第六讲至第十讲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俄关系，包括对早期及近现代两国关系的历史回顾，现实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及中俄关系未来展望。做历史和现实分析时，与一般对两国关系阐述的视角有所不同，更多地考虑了俄罗斯安全战略的影响作用。俄罗斯军事战略问题未列入专讲，窃以为军事战略问题需要更多的笔墨，非一讲之内所能深析，而着墨过多，又不符合重在安全战略和中俄关系的考虑，只好留待以后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另做专门探讨。

由于个人见识和笔力有限，疏漏错误之处难以避免，好在对于每一课讲什么都针对教学对象有所设计，更主要的是体现自己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也努力做一些梳理论证工作，付梓之际，也还坦然。

国防大学出版社黄建国副社长亲自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对一些章节的内容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文字工作尤其细致，给本书增色不少，在此特别表示感谢，也感谢所有支持和服务于本书出版的领导、同事和工作。更期待读者予以批评和指教。

作者

2015年6月

目录

Contents

- 1 / 第一讲 千年俄国的安全课题
- 26 / 第二讲 “反体系”实验与苏联国家安全
- 51 / 第三讲 转型期的国家安全挑战
- 74 / 第四讲 俄罗斯联邦的强国战略
- 105 / 第五讲 俄国的安全战略传统
- 129 / 第六讲 《尼布楚条约》下的百年和平
- 152 / 第七讲 近代中俄关系的条件与代价
- 177 / 第八讲 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
- 201 / 第九讲 多极平衡与中俄战略协作
- 223 / 第十讲 中俄关系前景展望

第一讲

千年俄国的安全课题

——俄国历史的安全决定因素

我们宁可陈尸疆场，也不让罗斯大地蒙羞。

——斯维亚托斯拉夫

一想起这个庞然大物，就令人不寒而栗。

——拿破仑

公元 1000 年之际，一位名叫弗拉基米尔的强悍大公统治当时的俄国，古代封建国家——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于公元 978 年至公元 1015 年在位，统治 38 年，开创基辅罗斯的强盛时期，史称弗拉基米尔一世。从弗拉基米尔一世统治至今，历史的车轮滚动一千年，其间俄国经历从基辅罗斯到莫斯科公国、沙皇俄国、俄罗斯帝国、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政治演变，王朝更迭，几度兴衰。当今俄国的统治者也叫弗拉基米尔，姓氏普京，全称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普京。他在新的千年之交登上俄国政治舞台，把他接手的一个危机重重的俄罗斯引向稳定和新一轮复兴之旅。

考察持续千余年的俄国历史，普通俄罗斯人的愿望和统治者的意志经常聚焦在国家安全课题上。俄国传承和演变至今的政权结构是一个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安全的政治结构，无论从自然地理、经济和人文发展的哪个方面理解，维护民族生存和发展安全对于俄罗斯国家都具有决定性意义。自然地理因素带有先天性和根本性，自然条件内在地决定民族与自然的关系，决定国家早期的生产内容和生产力发展。地理位置则决定民族与其他民族、文明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平坦辽阔的东欧平原，由于缺少自然屏

障，古代俄国生存在东西方强盛民族的轮番冲击之下，抵御侵略和通过扩张建立缓冲区是铁定不移的战略抉择。它推动俄国边界向四周移动，形成居于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庞大国家，是人类发展史上以版图面积而论罕见的帝国。进入近代，俄国的安全课题发生变化，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始发自西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者把越来越多的古代国家和民族纳入体系边缘，成为世界体系核心国家掠夺的对象。俄罗斯国家因此持续面临艰难的发展道路选择与安全挑战。

一、地理与欧亚强国的历史

当今俄国立国于亚欧大陆的北部。欧洲和亚洲的分界线——乌拉尔山—乌拉尔河和大高加索山将俄国的领土一分为二。这条存在于政区图划分和地理学家的想象中的洲际分界线完全不能反映俄国人对本国国土的自然和人文概念。俄罗斯人的主流观点是将本国定义为欧亚国家，一个完整的“欧亚洲”。地理和人类社会的自然发展将俄国塑造成一个既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亚洲的独特国家。

（一）俄罗斯人的民族国家

俄国古代史是指莫斯科公国以前的历史。公元九世纪以前，斯拉夫人没有自己的国家，社会处于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统一的俄罗斯民族尚未形成，自然也没有统一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意志。但是，当时已经具备生成古代民族和建立古代国家的人文和地理条件。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第聂伯河、维斯瓦河、涅曼河—西德维纳河、伊尔门湖地区的无际原野，森林和黑土地哺育了体格健硕、生性坚毅的斯拉夫人种，这是日后形成俄罗斯民族的自然条件，是俄罗斯的母亲。

公元9—16世纪初是俄罗斯民族的形成期，包括基辅罗斯、蒙古金帐汗国和莫斯科公国三个阶段。基辅罗斯阶段，俄罗斯人尚处于古代斯拉夫人的混合体中。公元十世纪末，弗拉基米尔大公统治时期，基辅罗斯归源自拜占庭帝国的希腊正教，即东正教。同一时期，维斯瓦河流域和西德维纳河流域的斯拉夫人接受来自罗马天主教信仰，斯拉夫人开始区分为西

斯拉夫人和东斯拉夫人。当初东斯拉夫人主要生活在第聂伯河流域、涅曼河流域和伊尔门湖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西部的诺夫哥罗德州和普斯科夫州。古代东斯拉夫人国家包括语言相近的多个部落和部落联盟，尚未形成民族自觉。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都有更强势的民族，他们东西驰骋，南北对进，在东斯拉夫人集中的地区形成早期民族征服的狂风暴雨。基辅罗斯本身是这种征服过程的产物，东斯拉夫人经历中欧日耳曼部落自西向东、北欧诺曼部族由北向南、亚洲游牧民族自东向西和中东拜占庭帝国自南向北的征服，逐渐得以建立起古代国家体制。基辅罗斯兴起后，东欧大地的征服风暴一直没有停息。受外部因素冲击，第聂伯河流域的部分人口向森林茂密的伏尔加河上游迁移，开始了东斯拉夫人的早期殖民。他们首先进入东北方向的森林地带，在伏尔加河上游建立新的定居点，进而发展成新的公国，其中之一是莫斯科公国（1261—1533）。莫斯科建城于公元1147年。向伏尔加河上游开拓并形成新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对于古代俄罗斯国家的发展和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十九世纪著名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将俄国史划分为“第聂伯河流域、城市、贸易的罗斯”“伏尔加河上游、分封公国、自由垦殖的罗斯”“莫斯科公国、沙皇—封建贵族、军事—垦殖的伟大罗斯”和“全俄、帝国和贵族的罗斯”四个时期。

东斯拉夫人的进一步分化发生在蒙古统治时期。金帐汗国是蒙古贵族征服基辅罗斯封建诸侯建立的殖民帝国，存在于公元13—15世纪，早期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1236年，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儿子拔都率蒙古铁骑征服分裂成众多邦国的基辅罗斯，建立起蒙古帝国的西支——金帐汗国。当时的莫斯科公国仅是基辅罗斯众多邦国之一，弹丸之地，被征服之后，在金帐汗国卵翼下生存也反抗了240年。^① 蒙古人统治的成果只是把它统治下的东斯拉夫人变成一个统一的大俄罗斯民族，即今天的俄罗斯民族。而由立陶宛大公国统治的西部，主要是第聂伯河流域和涅曼河—西德维纳河流域则形成小俄罗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蒙古鞑靼统治下

^① 从1240年金帐汗国建立至1480年莫斯科公国完全摆脱金帐汗国统治，时间为240年。——作者注

的俄罗斯人因广泛的经济和社会联系而日益产生出独立的民族意识，“意识到自身是具有同一信仰、同一语言、同一习俗的人，是具有同一心理气质的人”^①。俄罗斯民族由此诞生。

自负的俄罗斯人常将蒙古鞑靼统治视为制约民族发展的“桎梏”，因为蒙古贵族逼迫缴纳沉重贡赋的确是造成俄罗斯人贫困的重要原因。但是也有欧亚主义的有识之士则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早期欧亚主义思想家彼得·萨维茨基认为，欧亚大陆不能简单地划分为欧洲和亚洲，事实上还存在一个占据中间地位的既非欧洲也非亚洲的“欧亚”部分。大俄罗斯人不仅是欧洲东斯拉夫人的分支，而且是特殊的帝国民族聚合体，斯拉夫人和突厥人的胚芽结合在一起。“蒙古鞑靼的统治是锻造俄罗斯精神文明的大熔炉。俄罗斯是大汗的继承者，帖木儿和成吉思汗事业的继承者，亚洲的联合者。”^② 其实，大俄罗斯人不仅仅是斯拉夫人与突厥人结合的产物，在古代俄罗斯人殖民伏尔加河流域的时代，殖民同化过程淹没了众多芬兰人、鞑靼人、立陶宛人和其他古代民族。^③

莫斯科公国是最早的俄罗斯民族国家。十五世纪末，莫斯科公国摆脱蒙古金帐汗国统治取得完全独立，进而于十六世纪二十年完成对俄罗斯诸部领土的统一。这个新的国家是一个在东正教思想、莫斯科大公统治和诸多地方势力联合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政治共同体，统治权力只属于贵族，但是拥有一个统一的名称——俄罗斯，俄罗斯人的民族国家。如克柳切夫斯基所言：“莫斯科联合东北罗斯，把莫斯科公国变成大俄罗斯的民族国家。”^④

（二）独特的文明类型

现代民族形成基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往往是某一种文明的代表。地位突出的大民族自身成为一种文明，而更多的小民族附着在大民

① [苏] 马夫罗金：《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144 页。

② [俄]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萨维茨基：《欧亚大陆》，莫斯科阿格拉夫出版社 1997 年俄文版，第 334 页。

③ [法] 阿尔弗来德·朗波：《俄国史》，斯摩棱斯克罗斯奇出版社 2001 年俄文版，第 18 页。

④ [俄]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 2 卷，商务印书馆 1997 年中文版，第 113 页。

族体现的文明机体上，如同镶嵌在一种主要文明体上的珍珠。历史将俄罗斯塑造成一个有别于欧洲文明的独立主体，与西欧国家存在地理、种族和文化差异明显的独特文明类型。

从地理上看，俄罗斯人所在东欧平原具有与温暖湿润海洋性气候的西欧大不相同的特点，这里相对寒冷、干旱、地形单一。好在这一地区大河航运条件较好，主干河流自然伸向东、南、西不同的方向，有利于贸易和交流。第聂伯河流向黑海，由黑海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可通地中海，基辅罗斯时期东正教文化正是经这条通道传来，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伊斯坦布尔原名君士坦丁堡，历史上是拜占庭帝国首都，对俄国早期历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由伊尔门湖经沃尔霍夫河、拉多加湖和涅瓦河进入波罗的海，与西欧的联系由此建立。伏尔加河是俄罗斯人与里海、中亚游牧帝国以及波斯湾和印度联系的通道。不同时期，俄罗斯与相应地区的国家和民族保持联系。邻近的部族、民族和不同的文明类型对早期俄国和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发挥了重大影响作用。

源自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对俄罗斯民族精神发育发挥了特殊作用，是传承千年的俄罗斯民族信仰的基础。对拜占庭的宗教和文化继承是俄国与欧洲文化同源同时又保持距离、保持斯拉夫文明特性的重要因素。从接受东正教的那一刻起，俄国有了欧洲文化之根，它也自认为是欧洲国家、欧洲文明大家庭的一员。公元1054年，基督教东西教会分裂，位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教会与位于罗马的欧洲天主教会分道扬镳，致使基辅罗斯时期的俄国东正教只是东方教会的一个下属分支。1453年，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陷落于新兴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东正教中心东移至莫斯科，大大提高了莫斯科公国在欧亚大陆的政治和文化地位。十六世纪初，约瑟夫·沃洛茨基等教会人士提出带有浓重神权色彩的莫斯科国家理论，认为教会政权由普世和神性的上帝在人间建立，沙皇的责任限于在精神上保护臣民的灵魂，国家的使命是保护宗教。同时，沙皇因保护东正教而获得教会的鼎力支持。^① 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双重加强，使莫斯科公国在完成独

^① [俄]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夫：《俄罗斯民族与国家》，莫斯科阿格拉夫出版社1988年版，第60~61页。

立之后迅速强大起来。文化自信心增强，加上国家防卫能力的加强，使其能够形成并捍卫自己独立的政治和文化体系。

十六世纪二十年代，瓦西里三世（1505—1533）统治时期，普斯科夫地区叶列扎罗夫修道院院长费洛菲伊创立“莫斯科——第三罗马”学说，他于1524年上书瓦西里三世，声称“所有的王国都将因信仰不纯而被淹没，而新的俄罗斯王国将成为东正教的顶梁柱。所有的基督教国家最后将汇流成一个神国——俄罗斯帝国。在此之前，两个罗马先后衰落，第三个罗马（莫斯科）屹立不倒，而永远不会有第四个罗马”^①。由此，将由“莫斯科——第三罗马”完成世界历史的基督教时代，成就历史的终结。费洛菲伊把罗斯看成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联合因素，赋予俄国在世界历史中的特殊使命。同一时期，从此开始一个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留里克王朝的新时代——沙皇俄国时代，也把神圣使命植入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中，成为最早的俄罗斯民族思想。十九世纪的俄国东正教神学家索洛维约夫（1853—1900）的宗教救世论带有典型的民族主义色彩，他认为世界上存在“三种力量”，第一种力量是伊斯兰东方文明，第二种力量是西方文明，这两种力量都不能拯救世界和人类，只有第三种力量——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斯拉夫文明——才能起救世主的作用。宗教使命意识绵延流长，几经嬗变，直到今天积存于俄国社会思想深处。无怪乎俄罗斯东正教思想家别尔嘉耶夫（1874—1948）曾说：“在即将到来的全球时代，俄国被赋予向世界传达新约福音的使命。像过去拉丁世界和日耳曼世界的轮番崛起那样，在基督教的历史中没有单一的天选民族，不同的民族在不同时期为了伟大使命，为了启示精神而集合起来。”^②

草原游牧民族，特别是蒙古鞑靼统治的影响不可低估。蒙古鞑靼统治使俄罗斯长期脱离与欧洲的接触，与中世纪晚期以来欧洲的进步脱节，与此同时，以其游牧民族及亚洲式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制度给俄罗斯文化打上深深烙印。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前，这种影响具有决定性，它奠定俄罗斯文化的雏形，虽然后来历经变化，但始终能够保持传统特色。十九世纪的

^① 〔俄〕瓦列里·彼得罗夫：《俄罗斯地缘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0～71页。

^②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莫斯科哲学学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俄国最终建立起对自身文化和文明的自信。斯拉夫主义者丹尼列夫斯基(1822—1885)提出的“历史文化类型”代表俄罗斯人追求民族独特性的文化视角。该学者从不同文明的“历史文化类型”的角度提出新的世界历史观,摒弃欧洲中心主义,强调人类文明多样性、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的危险性。“一种历史文化类型的文明起源不能传给其他类型的民族,每个历史文化类型的发育或多或少会受到出现于它之前的或现代文明的不同文明类型的影响”;“进步并不是要所有民族走到一个方向,而是要走遍所有原野,走遍人类活动舞台的所有方向”。^① 二十世纪的欧亚主义者古米廖夫(1912—1992)进一步发展对俄国文明独特性的认识,他高度评价远东和中亚草原文明的作用,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角度解释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认为俄国文明是斯拉夫森林文明与突厥草原文明共生的产物。也因而,大俄罗斯是一个相对新生而年轻的民族共同体,有着无穷的“荣誉欲推动力”,它将欧亚俄罗斯或者欧亚帝国这样的超级民族共同体紧密地团结在自己周围,并注定要在不久的将来急剧地改变全球的政治文化地图,因为那些残存的古老民族的统治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②

(三) 多民族帝国

摆脱蒙古鞑靼统治之后,俄罗斯民族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逐步形成自己的国家体制,并迅速走上一条持续的版图扩张之路,经由扩张使独立的俄罗斯民族国家变成一个俄罗斯民族占统治地位的帝国。

以俄罗斯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帝国起源于莫斯科公国。公元1300年前后莫斯科公国的版图维持在2.1万平方千米左右。为金帐汗国打理税收事务的伊凡一世(1325—1341)深得蒙古大汗的信任,使莫斯科公国在众多邦国中崭露头角。1341年,伊凡一世去世之年,莫斯科公国拥有差不多相当于今日莫斯科州的版图,约为4.7万平方千米。伊凡三世(1462—

^① [俄]丹尼列夫斯基:《俄国与欧洲》,圣彼得堡格拉戈尔出版社1995年版,第77、92页。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26页。

^② [俄]古米廖夫:《民族起源和地球的生物圈》,莫斯科迪一迪克出版社1994年俄文版,第180~184页。

1505) 统治的莫斯科公国于公元 1480 年彻底摆脱蒙古人的统治, 实现国家完全独立, 他于 1497 年启用的双头鹰印玺成为俄国国徽, 除苏联时期外, 至今沿用。瓦西里三世 (1505—1533) 最终完成俄罗斯各部的统一。

代表大俄罗斯利益的沙皇专制制度是多民族帝国的政治纽带。沙皇是对罗马帝国皇帝恺撒的俄文音译, 伊凡四世 (1533—1584) 在俄国君主制的历史上首称沙皇 (公元 1547 年), 表示对东罗马帝国的继承, 俄国也由此进入沙皇俄国时期。伊凡四世是俄国历史上有大作为的君主之一, 他在位期间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和军事改革, 通过打击世袭贵族加强中央集权制度, 通过建立以“领地制”下的军役贵族和以射击军为主体的军事制度加强国家军事能力, 继而推行武力扩张政策, 连年发动兼并战争, 扩大沙皇俄国的版图。十六世纪五十年代, 伊凡四世的俄国先后吞并喀山、阿斯特拉罕和诺盖等汗国, 向东越过乌拉尔山脉进入西伯利亚, 向西向南逐步扩张到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 沙皇俄国日益变成一个多民族国家。1558 年在西线为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发动针对立沃尼亚的战争, 后来发展到与立陶宛、波兰和瑞典等多国的冲突, 战争持续 25 年, 最终一无所获。为支撑战争, 伊凡四世从 1565 年起建立沙皇特辖区, 推行沙皇特辖制, 以警察和暴力手段大量剥夺大领主贵族阶层的世袭领地, 沉重打击俄国封建制。伊凡四世性格暴烈, 喜怒无常, 在俄国历史上以“雷帝”之名著称, 其统治给俄国专制君主制和军事史打下深深烙印。

近代意义的俄罗斯民族意识在彼得一世时期确立。公元 1721 年彼得一世 (1682—1725) 称帝, 俄国历史进入俄罗斯帝国时期。俄罗斯帝国建立在改革、对内整合和对外扩张的基础上。彼得一世领导的欧化改革引发俄国社会的大震荡, 上流社会从东正教的神性文化中解放出来, 加速了俄国近代世俗文化的形成。彼得时期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体现在东方意识与西方民族观念的双向加强。如别尔嘉耶夫所言: “全部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的历史就是西方与东方在俄罗斯灵魂中斗争的历史。”^① 在与欧洲文化互动过程中觉醒的民族自尊感和自强意识, 推动俄罗斯人弃旧图新, 投身于追赶世界潮流的现代民族运动之中。这场运动体现为俄国的世俗化发

① [俄]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 三联书店 1995 年版, 第 15 页。

展趋势、俄罗斯民族的急剧扩张和多民族帝国的最终创立。

俄罗斯帝国作为近代国家明显具有政教分离的世俗化特点。为与社会改革相适应，彼得一世对教会进行彻底改革。在彼得一世之前，俄国历代沙皇都由东正教牧首主持加冕仪式，明确“君权神授”，沙皇是人世的上帝。教会享有独立地位，东正教牧首不止一次企图取代沙皇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彼得一世在政治上限制教会权力，使之处于世俗皇权的控制之下；在经济上也加强对教会财产的控制，利用教会的财富扩充国家实力。宗教改革伴随着与教会的势力斗争，1721年，彼得乘北方战争战胜之威取消教会对国家的独立，削弱宗教反对派的力量，罢黜反对改革和干预皇权的牧首，直至废除牧首制，确立以主教公会集体管理教会的新体制。管理主教公会的是国家官吏，教会从此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沙皇政府的附庸。^①

从十七世纪末开始，俄国的对外扩张开始具有世界意义。彼得一世从寻求出海口的需要出发，坚持对土耳其和瑞典用兵。通过超过20年的北方战争，最终打败瑞典，夺得波罗的海出海口，使俄国成为欧洲强国。彼得一世建立的帝国是以俄罗斯人为主体的民族压迫型帝国，不断扩张的民族生存空间成为寄托民族价值的精神归宿。成为一个帝国对俄罗斯民族的影响也有消极的一面。由于扩张太快，地理空间的膨胀超出了主体民族的文化融合和同化能力，俄罗斯人无法实现对被征服地区的整合，民族矛盾始终困扰俄国社会，国家安全因民族问题而经常受到挑战。甚至在俄国的地理核心——东欧平原俄罗斯民族的发祥地附近，至今存在排斥俄罗斯人和坚持自治自决的少数民族，更不要说边缘地区的挑战。帝国的边缘地区经常成为民族国家的分裂线。

在多民族的压迫型帝国，必须有能够汇聚民族共识的意识形态，以保障国家的凝聚力，使国家本身具有精神凝聚作用。鉴于此，主体民族大俄罗斯族的民族思想极为重要。历史上，俄罗斯民族思想与俄国国家体制、民族宗教信仰，以及民族关系协调紧密相关，帝国时期的国家凝聚作用主要源自沙皇专制制度、斯拉夫民族主义的帝国意识形态和东正教。沙皇专制制度是政治保证，斯拉夫主义的帝国意识形态和东正教是针对不同民族

^① 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页。

的精神统治工具。斯拉夫主义初期有东斯拉夫的限制，主要指大俄罗斯族、小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后来随着帝国的膨胀逐渐泛化，直至包括东欧和东南欧的所有斯拉夫民族。从大俄罗斯主义到泛斯拉夫主义，民族主义思想引导帝国版图扩张，激发弥赛亚意识，最终促使俄罗斯人担负起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使命”。

理解俄国历史的关键是把握和理解俄国的俄罗斯民族属性。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国家历史都是民族史，都有一个由血统、文化、宗教定格的民族本体。俄国历史首先是俄罗斯人的历史，这种民族主体性的自我意识并不总是很清楚，但至少从莫斯科公国获得独立时起，已经首先在统治阶级内部初步确立。彼得一世时期起，民族的帝国意识进一步增强。普遍的民族意识觉醒则从解放运动开始，大量从前为农奴的俄罗斯人开始具有帝国高等臣民的俄罗斯民族意识。社会是逐步解放的，民族是逐步觉醒的。有太多的因素阻碍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决定着觉醒之余的反复。但是无论如何，研究俄国的社会演进和文化发展，都要明确俄罗斯人的主体地位，明确进入近代以前，俄国是以俄罗斯人为统治民族的多民族帝国。

二、经济与近代俄国的半边缘地位

近代以来，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人们之间的了解和联系不断加强，国家安全与发展事业中人文因素的作用不断提升，国家的发展取向和发展战略越来越具有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决定本民族的国家利益边界，也决定民族国家与周边世界的关系，决定国家的安全。发展道路、威胁因素（安全问题）、安全战略和安全状况构成完整的逻辑链条，国家选择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即有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就注定会遭遇什么样的威胁因素。遭遇什么样的安全问题，面临什么样的威胁，就会因人乘势提出应对策略，做出相应的安全战略抉择。战略的成败最终决定安全状况，决定发展的条件，进而成为决定民族生死存亡和国家兴衰盛败的关键。近代以来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正是需要放在世界范围内对其生产力状况和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的过程详加考察。在沟通日益便捷的新时代，